

起事不空为 因因不妄作

——读任华南先生《魏晋风度论》

四 维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益阳 413000)

[摘 要]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一个非常特殊时期,其独特的魏晋风度、人文现象成为后人研究此一历史的重要话题。任华南先生近十余年研究之功,对这一现象作为较好深入的研究。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这是我国断代史上人文形态学研究的一大贡献。

[关键词] 任华南 魏晋风度论 书评

[中图分类号] C539

[文献标识码] A

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时期。这一时期,战乱不断,政权更迭频繁。在魏国,自曹丕以后,魏国政治越来越坏。明帝时,后宫人数众多,后宫消耗费几与军费相等。此外,魏明帝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在荥阳附近设方圆千里的大猎场,弊政不断,民不聊生。统治阶级内部,以曹爽为首和司马懿为首的两个集团矛盾更为突出。嘉平元年(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洛阳政变,篡夺朝中大权。后司马昭当政,他比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虽为皇帝的曹髦对臣下愤而叹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三国志》卷四《高贵乡公髦传》注引《汉晋春秋》)。于是率数百僮仆讨伐司马昭。以区区数百之众,进攻手执大权的司马昭,这无异于以卵击石,其结果可想而知:曹髦被杀。司马昭立曹奂为帝,政权完全为司马氏所控制。后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在灭蜀后,废魏帝曹奂,自立为帝(晋武帝),定都洛阳。史称西晋。西晋的建立,是在一批士族官僚的支持下,通过政变而取得的,所以虽后灭掉了吴政权,但分封宗室,导致了后来的“八王之乱”,加上“五胡”之乱,无疑加速了西晋灭亡,并出现了十六国东晋时期的南北朝对峙。

魏晋时期,阶级矛盾激化。由于门阀制度的出现,先是曹丕所推行的九品中正制,只重门第,不重乡议。司马炎建国后,更是借口“法宽有由,积之在素”(《晋书》卷四六《刘颂传》),由于这些制度的实施,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卷四五《刘毅传》);“公门有公,卿门有卿”(《晋书》卷九二《王沈传》)的局面。士族与庶族(又称寒门)界限

严明。政治上,士族累世为官,经济上,按官品占有大量土地与劳动人口,待遇上庶族不能和士族联婚,同乘共坐。如果庶族有为官者,不巴结士族,便一生沉滞,永无晋升机会,哪怕你才俊过人,也为“时豪所抑”,如若“朝中无援”,则“不如归田”。

在这样大动荡、大变革,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的大背景下,生活于这样环境下作为构成社会细胞的人,独特的魏晋风度出现是必然的。

—

学者任华南先生穷十余年研究之功,作煌煌数十万言之著,将魏晋风度作了人文形态学上的研究。这是我国断代史上人文形态学研究的一大贡献。

作者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对魏晋这一特殊时期从哲学、文学、美学、史学、艺术、宗教等方面探微,具体研究,将人们对魏晋风度读起来有些难以捉摸的东西作了具体的解剖。正如刘纲纪先生在《序》中所云:“把不可言传的东西尽可能予以言传。”使人豁然开朗,而不是停留在魏晋风度以“玄”为特色的难言之处,排除了“玄”上谈玄,不知所云的研究效果,而是具体、实际的研究,探宝山而得宝,非虚探宝山而盗名欺世。

华南先生循“尚用”、“为世用”的研究观,对魏晋风度的这一特殊现象是从一定社会条件下,针对一定的社会问题,寻找一定的社会原因,为着一定的研究目的而发的。

这正如王充在《论衡·对作篇》中所说:“是故周道不弊,则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杨·墨

[收稿日期] 2007-02-28

[作者简介] 四维,男,湖南宁乡人,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章学、文学理论。

之学不乱儒义 则孟子之道不传 韩国不小弱 法度不坏废 则韩非之书不为 高祖不辩得天下 马上之计未转 则陆贾之语不奏 凡论不乱坏 则桓谭之论不起。故夫圣贤之兴文也 起事不空为 因因不妄作 作有益于化 化有益于补。”作文要为世用 反对空文。“为世用者 百篇无害 不为世用者 一章无补”(《论衡·佚文》)。作文要为世用、实用；不能处定是非 辩然否之实 虽文如锦绣 深如河汉 民不觉知是非之分 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论衡·定贤》)。

华南先生的研究是积极的、认真的、刻苦的、为世用的。

其实 华南先生在写作此书时 有许多感人的小故事。他在写作此书时 为找资料 曾作数千张卡片。三伏天 赤膊而大汗淋漓地一人伏案整理 让女同事们大吓了一跳。书稿完成后 携书稿二上武汉 求刘纲纪先生指点。此书稿虽在当时列为出版计划 但市场经济的经济杠杆作用 因方孔兄所累 他的书稿出版又被置之高阁。“文章虽满腹 不如一囊钱”这是他当年的真实写照。

写书难 出书更难。这让他品味了个中酸楚。

时光倏忽。当“外国月亮比中国月亮圆”的喧嚣稍有沉寂 国学经典、国粹重新让人重视与审视之时 妄自菲薄 自我矮化的思潮 以及文化自虐的现象逐渐消逝时 这又勾起了任华南先生出版此书的想法。可是出版社原稿已失 只得从箱底翻出发黄的底稿 字字斟酌 重新整理。多年心血不能白流 中华文化的光辉不可抹煞 这是作为他的友人 我是深知华南先生心态的。所以 当他的书稿重新打印之后 付印之前 我便幸运地成为了他的第一个读者。于是乎 也便有了一些感想在此吐了出来 权作读后感 亦作书评。只是姑妄评之 姑妄评之罢了。

二

华南先生对魏晋风度的研究是多层面的 下了大功夫的。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它的特殊性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 表现为“两极性”：一方面是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事险恶、战争频繁的极恶时代 另一方面却又是思想上最少保守 哲学上最热闹活跃 人的自我意识的觉悟与对人自身价值的追求也最充分 因而是“中国人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正因为如此 反映在人文上 便体现其独特性。

所谓风度 我们知道 就是指人的言谈、举止、

对事物的态度。体现在人文上 由于魏晋时期的特殊背景 其人文形态也便变得多样性。作者因文化使命感与历史使命感使然 迈开大胆之步 涉猎此一时期各个方面 旁征广博。从其孕育条件 历史的演变、正负态的表现、人文精神活性文化形态特征、副文化形态、审美评判诸方面入笔 纵横有论 虚实相间 将其文化的虚无、民族的虚无、精神的虚无的矮化论调 在事实面前向隅而泣。

任华南先生该书在理论上是有突破的。

一是实践突破论。

这个实践突破 主要是指魏晋人在哲学上超越了前朝的两汉经学之外 更从实践的层面上对前朝经学礼教对人性的束缚进行广泛而全面地突破。其声势可谓波澜壮阔 大大超出了哲学上玄学突破的影响力度。这个观点的提出 在理论界是一个新的建树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任华南先生引经据典 对此作了较大篇幅说明。借此也谈谈玄学问题。玄学的出现 并非清淡。历来人们认为清淡即空谈 甚至有人将导致其国家之弱之因都推诿于清淡 其实这是错误的。反之 它不但有内容 而且内容丰富。哲理上以《老》、《庄》、《易》为主 经义上以《五经》为主；佛典则以《大品经》为主。善谈哲理者以何晏、王弼为最著名。至于经义 自梁武帝后 帝王亲自提倡 讲者更多 佛典亦然。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六朝清谈之习》一书中曾记载了许多史事。书中说：“清谈起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祖述老庄 谓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尝与郭象谈论 一座尽服。卫玠善玄言 每出一语 闻言无不咨叹 以为入微。王澄有高名 每闻玠言 辄叹息绝倒。”“至梁武帝始崇尚经学 儒学由之稍振。然谈议之风习已成 所谓经学者 亦皆以为谈辩之资。……梁时所谈 亦不专讲《五经》。武帝曾于重云殿自讲《老子》 徐勉举顾越论义 越音响若钟 咸叹美之。简文在东宫 置宴玄儒之士 邵陵王纶讲《大品经》篇 便与枢讲《维摩》、《老子》 同日发题 道俗听众二千人……”由上可知 清谈决非空谈。晋、宋之际 设玄学 极盛于梁。并且《庄》、《老》、《周易》名曰“三玄” 帝皇对此 且尝讲论不倦。“三玄”发挥的要义 非常之多 尤以“无为”、“齐物”解释得透彻。此一时期思想界中达观、无为、非君、非战、为我、享乐的倾向甚为昌行。以上主要是在理论上(玄学)的超越。在礼义上 不拘礼法 反虚伪 许多文人士子更是放荡不羁 空疏浮诞 任性浪漫 不讲规矩 有时甚至达到惊世骇俗。这样在实践的层面更加突破了前朝礼夫子们悲叹的“朝纲解纽 礼乐崩溃” 使之铺的更开 更进一层。

二是伦理回归论。

随着对魏晋人文现象的深入研究,任华南先生更是得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即魏晋人在追求自我价值、个体的自由自适,以及自我意识逐渐觉悟,在“实践的突破”的道路上大步向前时,由于玄学的兴起和发展,理论导向使人们的思想又发生了变化。导致人们的政治、伦理的回归。要不,中国的文艺复兴比欧洲的文艺复兴只怕要早一千余年,今日之中国恐怕不是今日之中国之现状。文化、思想上的闯劲早已超过了十四至十六世纪欧洲人的“文艺复兴”时的革命精神。毕竟,受时代与历史的影响,魏晋的“文艺复兴”夭折了。

遗憾的是,作者研究后在文中说:“由于眼前人生的苦难事实与历史精神的滋养,遂又生出宇宙时间意识的大宇宙境界。但因为此二者(指生命情调和宇宙时空意识)都包含了极大的情感因素与人生因素,所以魏晋人最终不能不孕育出‘以道自任’的历史使命心理,原本开始了的追求个体之自由、自适的任情、任我、任心的心理情感只得重新遭到压抑。而这庸庸又转入世俗的政治、伦理轨道,仍然继续着对人之外的价值意义的追求。经过这样一个大循环之后,魏晋人到底还是回到了他们原来出发的起点上。”

不错,历史毕竟是历史,不同的国度与地域,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思想影响,魏晋人的果敢与超越终究在走了一条“近似于圆圈式的大循环路线”,回到了起跑线上,作者归纳为这是魏晋风度的“悲剧”。其实与其说是魏晋风度特殊的悲剧性,不如说是中国历史与人文地域导致的悲剧。超越除了勇气之外,他的许多其它诸如文化的、思想的、政治的各种因素干扰与困惑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难以逾越的。作者发现了这一点,是了不起的。

三是审美评判论。

将历史与人文的研究放在审美的角度上进行分析,这无疑又是任华南先生此书的一大亮点。什么叫美?美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自由创造的感性显现,是人类理想、智慧、才能的形象化表现,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肯定确证。其实说穿了,美是一种社会现象,离开了人类社会生活就无所谓美与不美,美对人才有真正意义。它必须通过人的主体认识。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说过:“美是到处都有的。”美的内涵与外延广泛。有文艺美、生活美、自然美、社会美……得看人们如何去感知、去评判。

作者将魏晋风度放在了一个美学范畴来进行研究与评析,无疑使之研究的触角伸到了理论的更深层次。华南先生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来揭示人

类文明史、人文史的某种规律,其审美结论并不仅仅停留在“悲剧性”与“喜剧性”上。其实,喜剧是将丑陋的东西揭露给人看,鲁迅先生说:“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而悲剧呢?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也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美、丑因人而异,因心而异,因时而异。审美的差异在历史的时空下,评判各不尽同。魏晋时代名士及重要代表人物之死之悲,在于历史使然;“有为”者难逃命运的捉弄,悲剧的根源在于其政治与伦理的利剑高悬。至于其喜剧性,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笑剧”性,大多体现在一些个人的行为出格(有损所谓伦理、礼法等)上,如人生的闹剧(裸游、裸吊等),个性张扬(荒诞举止行为),渲泄人的情感(对礼法的冲击)。它冲出自古以来的礼法,突出人性化成分,追求个性自我解放。幽默与滑稽的表现,是对现实的嘲讽与挑战……这些都体现了魏晋风度的特殊性。华南先生用大量的事实,对其进行了审美评判,有些评价很有见地。

三

魏晋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因其特殊性,历代以来人们对它的研究是比较多且广的,其著作与论文可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但任华南先生独辟蹊径,从“风度”上选题,从人文形态上着手,从比较的研究手法上着墨,材料之丰,研究之深,论证之严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

愚以为,华南先生大作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从人文形态学上入手,从“风度”选题,微中见大,反映了魏晋风度整个风貌及魏晋特殊时代的特殊性。

魏晋的士风,这在中国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加之玄学的形成与发展,给士风的特别更是添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要剥去这层神秘的外衣,就必须在人文形态上,风度上着手,透过现象看本质,正本清源。我们知道,魏晋风度是魏晋人所独具的风貌与品格、精神、态度的特殊人文文化现象。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在魏晋以前的历代历朝都是少见的,个案是有(如庄子丧妻,击缶而歌),但作为一种群体现象则是没有的。作者用丰富而大量的事例,从微观剖析,从整体把握,运用科学的、辩证的史学观、美学观来揭示魏晋风度的本来面貌,从而揭示出魏晋人的精神风度与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文学、人的心理及至地理环境和客观物质生活内容等诸方面的有机内在联系。”并不是玄而谈玄。

其二,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分析、研究魏晋风度,解剖了魏晋风

度的特殊性之所在。

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与诸多因素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作为一种独特的人文现象——魏晋风度在魏晋时代出现,他并非偶然。作者在“前言”中也说得很明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方论,突破旧的思想体系的束缚,努力吸收现、当代以来新的理论成果,从微观角度就魏晋风度重要的孕育条件、历史演进过程、实际存在形态、人文文化形态特征,以及它的副文化形态和审美评判”作了较为系统地探讨研究。确实,作为一段特殊的历史,魏晋的变化之复杂、环境之复杂、社会之复杂是任何一个朝代难以比拟的。正因为它的复杂性,才孕育了魏晋风度这一独特的人文现象,表现在它的形态上则是光怪陆离,眼花缭乱。要在这种复杂的历史中探究魏晋风度,研究者不具有独特的慧眼,先进的方法论,是无从入手的。要不就会掉入迷宫,要不就会进入空幻,成为新的“玄学”。这样就会走入研究的怪圈,研究玄学而成为“玄学”,使之茫然而不知所为了,那是悲哀的。任华南先生站在历史的高度,纲举目张,使魏晋风度这一特殊历史人文现象、文化形态列好队,在读者面前走过,活生生而又具体鲜活。读其书有哲理思考缜密的甘味,又有艺术欣赏审美的情趣,而不是味同嚼蜡枯燥空文的厌烦。开卷有益,受用无穷。任先生带我们穿越历史的时空,剥离了玄而神秘的外衣,清楚地认识了魏晋风度这一独特人文现象。

其三,选用大量史实,将其综合比较分析,做到了魏晋风度那“不可言传的东西尽可能予以言传”。

将理性的概念用感性的事实说明。作者结合历史背景,分七大论题将魏晋风度的表现划分为各种不同类别,一一作了考察、述评。如“现实政治”则列举军阀政治、篡权政治、派系政治;“社会时尚”则列举人物鉴赏风气、谈玄析理风气、交友与饮酒服药风气,如“魏晋风度的历史演进”,分出世与入世、积极进取与放散任诞;其“风度”又分为正态与负态的表现和反应;其人文精神又分为活性文化形态与副文化形态;审美评判“又分为悲剧性与喜剧性……既分板块类型,举例论证;又进行不同两个侧面的

评述。这样对魏晋风度到底所指何物、什么意思有了具体了解,而非雾里看花。作者举例魏晋时人的荒诞与拒礼法:文人王粲喜欢作驴叫,死后出葬时,魏文帝曹丕亲自参加其葬礼,环顾四周对其同行者说:“王粲生前喜欢做驴叫,我们大家各作一声驴叫来送他。”于是所有参加葬礼之人都一一作驴叫。荒诞吗?荒诞到了极点!有违礼法吗?皇帝带头学驴叫简直将礼法抛之于九霄云外了!一个帝王为臣子送葬,如此举动,今人听来都有些诧异了。

其四,用美学的观点来审视评判魏晋风度,使之知美丑、辩是非、明得失、懂荣辱。

美具有多重性。对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人文形态进行审美评判,本来是一个难以驾驭的问题,作者从审美感受出发,避开优美与壮美的状态,选其悲剧与喜剧性这二个庄重话题来谈。悲剧与喜剧是两种审美感受的状态。喜剧与悲剧其根本都是两种社会力量的冲突的结果。悲剧是指正义与非正义的两种社会势力的冲突中,代表正义的社会势力暂时被代表非正义的社会势力所压倒,而遭到失败或牺牲。而喜剧的结果呢?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如果说悲剧是以美的毁灭来赞叹美,那么喜剧则是对丑的否定来肯定美。前者是哭,后者是笑。作者在魏晋风度的审美问题上,并没有公式化、简单化、概念化地停留在悲剧性和喜剧性的美学理论上,而是作进一步深层次的探究,如情感心理、精神趋向等。诚如作者自己所言,审美是“从魏晋人之外部形象集合和内在情感、精神相结合的角度,对魏晋风度作出最理性的审美特征概括。”它的最大的审美特征就是“超越性与精神性”。这真是难易之论。

华南先生该书理论上有所突破,写作上有特色,研究上有深度,本人由于才疏学浅,难以对华南先生大作作系统全面分析、评价。以上所谈,仅为一孔之见,难免挂一漏万,百疏而无一密,恐辱华南先生之作及其嘱我作评美意,权为抛砖引玉,望大方之家指点。

(责任编辑 华南)